

胡适与梅兰芳的交往推动戏曲跨文化传播

——从胡适与梅兰芳的两封重要书信谈起

刘 颖

关于梅兰芳与胡适的两封书信往来，新近被笔者发现藏于梅兰芳纪念馆，涉及梅兰芳访苏之事。两封信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印证梅兰芳与胡适之间的关系，而且涉及重要的第三次出访苏联。两份信函手稿尚属首次发现，史料文献价值很高，为胡适与梅兰芳交往的一手材料，足证梅兰芳与胡适交往关系的递进及胡适在梅兰芳访苏的整个筹备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亦可看出新旧文化人、戏剧人思想观念在时代和历史变幻中的冲突与互融。我们不妨先将梅兰芳与胡适的交往过程，作一梳理。

一、新旧戏剧论争的时代喧嚣：梅兰芳的访日演出

梅兰芳出访的成功，离不开梅兰芳个人的艺术成就和远见卓识，离不开“梅党”全力的扶持与支持，也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熟悉西方文化者——胡适的鼎力相助。

如果时间回到1917年3月，文化月刊《新青年》正式吹响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以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新青年派”，他们认为西方戏剧是“先进”的，中国旧戏是野蛮而落后的。

1919年与1924年两次访日，梅兰芳精湛的技艺受到日本观众的称赞。日本重新将中国戏剧纳入本国文化的参照系，以纠正盲目崇拜西洋的风气。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国戏剧学家青木正儿，在观看梅兰芳的演出后，曾于1920年专门给胡适寄去《品梅记》，青木正儿在信中表达了对新文化运动的赞同，同时也提出中国戏曲与西方话剧分属不同“属别”，实与西方歌剧、舞剧更为接近，均以“歌”“舞”的创造为其舞台表达，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不能被西洋话剧所取代。

胡适在随后的回信中，称赞青木正儿的观点“认识正确，见解平允”，并承认自己对于音乐完全是“外行”，在戏剧论争中对于旧剧的言论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是有欠公允的。“我们的能力太薄弱了，恐怕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

二、完美的“遗形物”：胡适推动梅兰芳访美

实际上在众声喧哗的20世纪20年代，作为东方戏剧标志性人物，梅兰芳的舞台形象已大放光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不断向来自异文化圈的西方人士展示着戏曲的独特美感。世界各国名流来到中国，许姬媛、许源来在《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中说道，“把逛长城、游颐和园，访梅兰芳列入日程。”梅兰芳所居住的北京无量大人胡同，成为接待外宾的重要场所，接待过欧美各界人士，诸如奥地利小提琴家费里茨·克雷斯勒、英国作家萨默塞特·毛姆、瑞典王储夫妇、美国威尔逊总统夫人、约翰·杜威、伯特·罗素等。这是美国人欧奈斯特·K·莫在1930年编印的《纽约如何看待梅兰芳》中记录的一份名单，其中就包括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时的导师——杜威先生。1919年，杜威应胡适邀请来华讲学，本打算短期停留，因其讲座大受北大学生欢迎，便在中国停留三年。杜威东游期间，“他的学生胡适先生陪同他观看梅剧、拜访梅寓。”越来越多的外国名流通过观看梅兰芳的戏剧表演去了解东方文化，在东西交流与对话的情景中，处于“弱势”的旧戏因不断获得西方人的肯定而得到自我证明，胡适对梅兰芳“也有相当的赞成”，结下深厚情谊，“无量大人胡同之梅邸，亦时见胡之踪迹，而胡对国剧之批评亦豁然改观矣，此诚梅之魔力也耶？”尤其在1925年，胡适在北京“常在开明戏院看梅兰芳的戏，更加许多的好评。”胡适因提倡新文化主张废弃旧戏，又因与梅兰芳的友谊对旧戏颇有“好评”，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亦招来不少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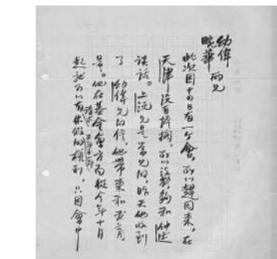
1925年，胡适之所以常去看梅兰芳演戏，



梅兰芳（前排右二）归国后在上海与冯幼伟、顾惠庆、胡适、钱新之、叶扶寅等人



梅兰芳给胡适的信



胡适给梅兰芳的信

则是因为梅兰芳自日本东归之后，“访美”事宜已提上日程。

为了促成梅兰芳访美，胡适借助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力，专门“替梅大王写上许多介绍信、给美国著名人物”，向西方宣扬梅兰芳。又在梅兰芳的恳请下，将《太真外传》的剧情“用英、日文分别译出，俾外人易于了解。”在梅兰芳出访前夕，胡适每晚在梅宅听戏，帮助梅兰芳改戏选戏：“当年梅兰芳要到美国表演之前，他每晚很卖气力地唱两出戏，招待我们几个人去听，给他选戏。那时一连看了好多夜。梅兰芳卸妆之后，很谦虚，也很可爱。”胡适主动撰写英文文章《梅兰芳和中国戏剧》，发表在旧金山编印的《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英文专辑中，向美国观众推介梅兰芳。文中称赞梅兰芳，“是一位受过中国旧剧最彻底训练的表演家”，擅长表演以昆曲为代表的旧剧和用胡琴伴奏的皮黄新剧，他的表演将历史上的“遗形物”以艺术的形式完美地保留下来，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曾看到的。

此外，在胡适的帮助下，梅兰芳巡美演出，得到美国学界的支持，“美方赞助人名单上，杜威博士的大名赫然在目。”以胡适为首的“新青年派”为推动梅兰芳访美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们参与编写《梅兰芳歌曲谱》，发表关于推介旧剧的文章，“认识到旧剧所代表的民族精神与艺术品性，并站在中国艺术的审美立场为旧戏的合理改良寻找西方的戏剧经验，拓展了中国戏曲的世界性文化空间。”梅兰芳访美代表了一个时代艺术精神的跃动，预示着历史将要转入一个以中西文化对等交流为标志的新阶段。

1930年1月18日，梅兰芳一行22人带着古老的“中国艺术”扬帆起航，搭乘邮轮从上海经日本赴美，开中国戏曲界未有之创举，在西方文明中发扬中国之文化。启程之前，送行者名流云集，胡适也专程赶到码头，与梅党“恭送梅大王”。7月18日梅兰芳载誉归国，次日各界人士在上海大饭店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中外来宾200余人到场，胡适亲自主持欢迎会，并在会上致辞：

梅氏游美之成功，固不必言，其尤为重要者，则梅氏介绍中国戏剧于外人之前，使知中国戏剧之真相而免模糊之揣想。梅氏启行之前，同人等预料其成功可待今果然然，亦足见梅氏之艺术造就，自有过人之处。

三、发扬国光，争胜国际：胡适与梅兰芳访苏

1934年3月，梅兰芳在收到苏方的邀请之后，便着手筹备出访。梅兰芳旋即给胡适去信寻求帮助：

适之先生：

好久不见了，这大热的天，想您的文章一定少做几篇。听说北平今年多雨，您院里的松树一定长成可喜了。前一个多月，我在开封唱义务戏赈灾，很想绕回北平见您，没想到苏俄又来电报说我不能回上海筹备出国的一切。我这次出国是先到苏俄后到欧洲各国。苏俄这次是先来好些电报，由国家戏剧协会接洽一切，依照工程师待遇，我已经答应他们了。现在大概十月必须到莫斯科。于欧洲除法国已有国家大戏院略有接洽以外，其余还未接洽。这次出国当然是极谨慎的准备。希望能比上次赴美更有相当的结果。但是我希望前往的第一希望是想得到您一篇对我此次出国的见解。我终以为，上次美国有若干成功实是由于您的一篇文章的指导和引起美人的兴趣。所以我这次又想于这大热天，来求您费半响的功夫，给我们一个启示。想您一定能允许我的请求，因为这事的筹备很繁杂，所以齐如山先生特地由北平赶到上海来，他这几天要回平了，还想到府上奉看先生。

确定访苏时间为1935年3月15日，在莫斯科表演五日，在列宁格勒表演三日，演出结束之后梅兰芳即可赴欧陆之游。

但笔者新近在梅兰芳纪念馆发现一封胡适致梅兰芳、冯幼伟信函，信中涉及胡适促成余上沅的具体信息以及完整记录，兹具录如下：

幼伟、晚华两兄：

此次因十四日有一个会，所以赶回来，在天津没有耽擱，所以没能够和你谈话。上沅兄是常见的，昨天他收到了幼伟兄的信，他带来和我商量，他在基金会方面从今年十月起就可以有休假半年至一年的权利，只因会中经费不充裕，所以未曾有所决定。

依此间休假办法，他可以得全薪，但问题在

于旅费。他和晚华兄出去，旅费当然不成问题，我已把你们的意略告他了，但他亦愿意知道详细的，有下面的几点：

- 1.晚华赴俄，何时出发？在俄住几时？
- 2.在欧洲各国游历去查共若干时？拟游若干国？

这几点确定了，他才可以计划（划）他的旅程。大概他的意思还注重和晚华同游后，他自己还能有一点时间在英国作半年上下的研究，所以他要先知道晚华在苏俄及欧洲的时期。

关于同游的事，我们谈话的大概是1.他可以同往苏俄。2.他可以同晚华在欧洲各中心游历考察戏剧艺术情形。3.在上述两项同等时期，旅费及生活费由晚华方面担负（个人零用当然由他自己担负）。4.晚华回国后，上沅自己留在英国，他计划（划）至少留学半年，现方筹画（划）此项经费，中基会方面能津贴他多少，此时当未能确定，故他专项计划（划），此时当未能具体决定。

我所能报告的，大致如此。你们已得了悲鸿兄的同行，若能和他面谈一次，或可将在欧各国游历情形大致决定。此时要注意的一点是夏季各国都不是戏剧、歌剧、音乐的时节，剧场虽不全停，大要无最精彩的东西可看。

忽问
大安

胡适上
廿三，十一，廿六

在胡适的大力推荐下，余上沅正式加盟梅兰芳剧团，成为访苏演出的副指导，发挥着沟通中苏的重要作用，在访苏之后的游历，也一路陪伴着梅兰芳。

余上沅是胡适的学生，先后在匹次堡卡内翰大学戏剧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戏剧文学和剧场艺术专业，语熟西方戏剧。

余上沅认为：“‘国剧’决不能当做代表中国唯一的戏剧，而将新话剧屏逐洋剧外剧之列。盖中国今日决不能学闭关时代，故步自封”，梅兰芳对余上沅的观点大为赞同。在经过访美之后，梅兰芳已“开眼看世界”，他站在中国艺术的立场，提倡旧剧在发扬自身的艺术表演时，应提倡借鉴西方话剧、新剧之优点，弥补在思想观念上轻视或缺乏现代意识的不足，扭转沦为声色表演之倾向。

1934年的除夕，冯幼伟特地到上海与胡适晤面，“谈梅晚华出国事”，当天夜里，张彭春、余上沅、梅兰芳、冯幼伟等人在国际大饭店济济一堂，共商访苏。新文化人与热爱旧戏的梅党，各自抛开先前的偏执，托诸戏曲表演，俾其文化交流，以比较互观的慧眼眼光，将中国戏曲成功推向西方，蔚成多元戏剧体系之重要一元。除夕夜话，辞旧迎新，围坐团圆，也预示着1935年梅兰芳“研究国剧，发扬国光”的访苏之行，序幕已缓缓拉开。

新旧戏剧论争对中国戏曲进行猛烈的抨击，对传统艺术“矫枉过正”的伤害已是客观事实。但梅兰芳在时代的喧嚣中，遵守戏曲艺术的本真，从古典文化中吸取智慧，通过访日、访美、访苏等活动，维护旧剧的存在尊严，同时也用“现代性”的眼光，重新激活旧剧的创造性生机，扩大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生命空间。胡适在梅兰芳三国出访演出中，亦经历了戏剧观念的变化，从立足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斥责旧剧为无用的“遗形物”，到积极推动梅兰芳的访美、访苏，他也逐渐发现旧剧应有的价值，倡导通过借鉴西方戏剧的长处，以知识学的建构来维护中国戏剧的尊严，真正建立起中国戏剧的学术体系，提升民族艺术的精神，并在跨文化的传播中，积极将中国戏曲融入世界戏剧的体系中去。

（作者系梅兰芳纪念馆原馆长，本文发表时有删节，题目为编者加）

赵剑英：用学术出版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本报记者 谢颖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组织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成果发布会暨‘一带一路’十周年学术研究回顾与展望研讨会”。

本次发布会重点发布了《“一带一路”倡议：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带一路”手册2023（英文）》两部成果，并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单位、出版单位从不同角度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间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赵剑英表示，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走深走实，加强学术研究、理论支撑和话语体系建设，为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提供理论支撑日益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赵剑英介绍，1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一带一路”出版工作方面做了许多探索与创新，策划出版兼具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多品种、多系列的“一带一路”主题学术图书200余种，如《“一带一路”倡议：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带一路”手册》等，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未来将继续推出更多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国际影响力、话语体系建设的精品力作，着力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

莫砺锋：传统文化要走出学术象牙塔

本报记者 杨雪

“向全社会普及古典名著是传承文化最有效的手段。”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莫砺锋曾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如是说。中华文化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时间长河中始终屹立不倒、生生不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更好地将它传承下去？近日，在杭州湘湖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讲坛上，莫砺锋以《文化传承与古典诗词》为题，分享了他的答案。“现在提到文化传承，首先提到的就是古诗。”在莫砺锋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核，就保存在用汉字书写的中华典籍中。

但古典典籍浩如烟海，要读哪些？如何去阅读？莫砺锋认为，文化传承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汗牛充栋的历史古籍中挑选出最重要的古籍。“学术界要为大家提供一份从传承文化角度进行阅读的可靠书单。”

除了《论语》，在莫砺锋研究的唐诗宋词领域里，他最推荐读的是“诗圣”杜甫的诗。“杜甫的诗不仅是文学的经典，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莫砺锋认为，杜甫是将“仁者爱人”的儒家核心精神，用优美的诗歌语言和生动的生活场景表述出来。

“我们要把《论语》《孟子》，要把‘杜诗’这些文化典籍推向全社会，让它们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我相信《论语》和‘杜诗’这样的经典，后代读者只要认真阅读，一定会受到里面所蕴含着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极大提升人生境界，这样也有利于我们建设现代中华文明。”莫砺锋说。

吴为山：抒写闪光的刻痕

本报记者 张丽

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闪光的刻痕——徐匡绘画作品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徐匡历经半个多世纪创作的经典之作130余件。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为山表示，“中国现代版画艺术，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也是对西方版画进行本土化的融合与创新。一代代优秀版画家在书籍插图、革命斗争宣传、新年画改造以及版画本体艺术探索诸方面，都留下了无数精品力作。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中，版画发挥了教育与审美功能，更以其独特的艺术创造与美学风范影响了时代审美。徐匡，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版画家。”

“作为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版画家，徐匡先生在人民火热的现实生活理想、劳动美、创造美，以刀笔记录着日新月异的山河巨变，创作了大批真诚真切、撼人心魄的版画力作。”吴为山表示。

本次展览分“从《传》出发：光影的灵动”“探寻《大江之源》：生活的诗意”“开拓《新路》：形式语言的强化”“《天地吉祥》：刀笔刻绘的原版独创”4个篇章，对徐匡艺术生涯的不同时期进行了系统梳理，展出了《主人》《奶奶》《天地吉祥》等重要代表作品。这些现实主义的作品记录了时代变迁和社会生活，折射出徐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观众可以从中国窥见生活之美以及徐匡艺术人生的风骨与精彩。

刘跃进：叶嘉莹诗歌研究的三个特色

本报记者 郭海瑾

今年是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百岁华诞。近日，南开大学举办“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此为叶先生祝寿。

研讨会上，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表达了自己对叶先生的崇敬之情。他表示，自己和众多的追随者一样，喜欢读叶先生的诗词创作，也是生诗词教育的受益者。他本人又更进一步，追随先生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成为一名专业工作者。

对于叶先生诗歌研究的一些特点带给人们的启示，刘跃进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诗歌与人生的关系。读叶先生的作品，我常常可以读出一种抱朴守静的孤独、一种独善其身的寂寞，以及由此升华的生命体验和美学感悟。二是文学的功与价值。文学关乎世道人心，关乎国家未来。基于这样的认识，叶先生用一生的时间，就做一件事：弘扬诗教，滋润心灵，将文学之大用，发挥到极致。她说：“早年，我的老师顾颉刚先生是这样引领我的，我也要引领年轻人。这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我喜欢读叶先生的诗词创作，也是生诗词教育的基本方法。可以概括为三种：一是比较的方法，二是文献的方法，三是细读的方法。叶先生论诗，比较研究是最重要的方法。”

刘跃进表示，叶先生以她百年人生经验告诉我们：文学必须紧扣时代，文学必须触摸人生。只有这样，文学之树才能常青，生命之光才能长存。

怀念作曲家施万春先生

郝钧剑

大作曲家施万春先生去世了，与黄永玉先生一样，他是我此生中仅见过两面，却影响了我一生的人。

1979年春节一过，我便从桂林来到了北京，来找老师上课。我是1975年开始“北漂”来北京学习唱歌的，为期近一年。在那段时间里，曾先后考取过总政歌舞团和中央民族歌舞团，但由于当时我家有“海外关系”的原因都未能成行。但也因此“诱惑”我向往北京的“贼心”便不死了。在那个年代里，本来初中毕业的我是要到广西的边境种橡胶的，不料阴错阳差我竟考上了文工团学唱歌。父母教诲我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就必须咬牙坚持也要走下去！加上自己知道自己的声音条件不是最好的，因此在学习上我格外刻苦。当时我同时在向林俊卿先生学“咽音”，向李培良先生学“乌音管”，向曾谓贤先生学“哼唱”，向张权先生学“面罩”，向方应喧先生学“开口心”。因为那时候所有的音乐学院都停办了，所有的学习只有靠这一种在社会上“漂泊”的方式来解决。自1975年后，我每年都



从桂林来到北京，来找老师学习。记得1979年那次来京，在方老师班上上完课后他对我说，他们总政歌舞团正在招生，以我现在的水平，可以去试一试。他给我安排了两首歌，一首是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一首就是施万春先生的《送上我头头的思念》。

那天下午3点我就去了新街口小七条九号的小院二楼考场。当时总政歌舞团有个庞大的声乐教研组，那天方应喧、王萃年、杨彼得、龚敏、邓文杰等先生都在。他们听完了那两首歌后就让我走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陆德培副队长就通知我考取了，连复试都没有复试。后来我才隐晦地知道，是在场的团政委洛涛听完了我唱《送上我头头的思念》后，当即表示，这个孩子乐感好，一定要留下。

《送上我头头的思念》是一首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歌。是施先生为柯岩先生的一首诗谱的曲，开头四句是：“假如我是一只鸿雁，我将展翅飞上九天，去看望日夜思念的周总理，可曾为我又把白发增添。”我记得那首歌唱的不是“日夜思念”，而是没改过的“两年不见”。也许当时还正处在周总理刚去世不久的那个历史阶段吧，我还记得唱到这里时我流泪了，估计是洛政委被我打动了。

施先生那几年很红，一首他为电影《青松岭》谱写的歌曲，由蒋大为唱火的《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几乎成了所有男高音的必唱作品，我也在演出中多次翻唱。加上知道了他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主要作曲家之一，尽管当时我虽然没有见过他，却对他崇拜得不得了。